

● 曹靖国 著

中  
國  
近  
代  
新  
史  
學

● 吉林大学出版社

# 中国近代新史学

曹 靖 国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 **中国近代新史学**

**曹靖国 著**

---

**责任编辑：李万生**

**封面设计：张沫沉**

---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东中华路29号)**

**长春市兴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992年10月第1版**

**印张：13**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310千字**

**印数：1—2300册**

---

**SBN 7-5601-1274—9/K·39**

**定价：(平) 7.80元**

**(精) 10.00元**

# 目 录

## 第一章 封建史学的蜕变期（一）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史学

<b>一、乾嘉考据学的没落</b> .....	1
<b>二、龚自珍的史学思想</b> .....	7
1、龚自珍生平及其主要史学著述.....	7
2、批判社会的改革思想.....	9
3、社会历史观及其“三世说”.....	11
4、爱国主义思想与边疆历史地理研究.....	15
<b>三、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及其史学</b> .....	18
1、魏源的生平及其主要经史著述.....	18
2、社会改革思想和“三世三复”说历史观.....	19
3、《圣武记》的编写及其主要思想内容.....	27
4、《海国图志》的编写及其主要思想内容.....	33
5、魏源历史观的倒退.....	39
<b>四、张穆、何秋涛的边疆历史地理研究</b> .....	40
1、张穆与《蒙古游牧记》.....	40
2、何秋涛与《朔方备乘》.....	47
<b>五、梁廷枏与鸦片战争史研究</b> .....	54
1、梁廷枏的生平与《夷氛闻记》的著述.....	54
2、爱国的史学思想.....	56
3、军事改革主张.....	60
<b>六、夏燮与鸦片战争史研究</b> .....	64
1、夏燮的生平与《中西纪事》的著述.....	64

2、鸦片战争史观.....	66
3、揭露投降派与同情人民的抗英斗争.....	70
<b>七、姚莹的经世思想.....</b>	<b>73</b>
1、姚莹对封建末世腐朽没落的抨击.....	73
2、姚莹的经国济世思想.....	76
3、姚莹抗敌御侮和学习西方的思想.....	78

## 第二章 封建史学的蜕变期（二） ——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

<b>一、冯桂芬的历史观及其社会改革思想.....</b>	<b>85</b>
1、进化的历史观点.....	85
2、改弊政、重人材的思想.....	88
<b>二、王韬的史学思想与对普鲁士、法国史的研究.....</b>	<b>91</b>
1、王韬的生平及其主要史学著述.....	91
2、王韬的史学思想.....	92
3、对普鲁士、法国史的研究.....	96
<b>三、郑观应的史学思想.....</b>	<b>101</b>
1、郑观应的生平及其主要著述.....	101
2、郑观应的历史观.....	102
3、反侵略的爱国史学思想.....	104
<b>四、黄遵宪的日本维新史研究.....</b>	<b>107</b>
1、黄遵宪的生平及其主要史学著述.....	107
2、《日本国志》的编撰.....	108
3、黄遵宪的历史观.....	112
4、《日本国志》中“君主立宪”的改良 思想.....	117

<b>、康有为的史学思想</b> .....	119
1、康有为的生平及其史学著述.....	119
2、康有为前期的“三世说”历史观和疑古思想.....	121
3、戊戌变法后康有为“三世三重”说历史观.....	127

### 第三章 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想的兴起

<b>一、西学的传入及对中国新史学兴起的影响</b> .....	131
<b>二、史学求“新”和“史学革命”的提出</b> .....	136
<b>三、新史学理论的输入和影响</b> .....	138
<b>四、文明史学思想的输入和影响</b> .....	144
<b>五、“民史”思想的兴起与发展</b> .....	148
<b>六、提出新的修史方案和重新编写历史</b> .....	160
<b>七、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b> .....	171

### 第四章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

<b>一、梁启超的生平及其主要史学著述</b> .....	180
<b>二、对中国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和新史之“界说”</b> .....	184
1、批判“帝王中心论”和“正统观”.....	184
2、新史之“界说”.....	191
<b>三、梁启超的历史观</b> .....	194
1、早期历史进化论.....	194
2、进化史观.....	201
3、地理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	212
4、英雄史观.....	227
<b>四、梁启超的史学方法</b> .....	242

1、关于史料的搜集	242
2、关于史料的鉴别	244
3、关于史料的整理	245
4、关于专史的编纂	247
<b>五、梁启超的史家“四长”</b>	<b>249</b>
1、史德	250
2、史学	252
3、史识	254
4、史才	256
<b>六、梁启超对中国通史的编纂和设想</b>	<b>259</b>
1、对中国通史的写作	259
2、对中国文化史的编纂	265
<b>七、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倒退</b>	<b>269</b>
1、对历史意义、目的的修正和对封建旧史批判的后退	269
2、对历史“因果律”的探讨及史观的倒退	274

## 第五章 新史学思想理论的实践者 ——夏曾佑、刘师培的史学

<b>一、夏曾佑的史学</b>	<b>287</b>
1、夏曾佑的生平与《中国古代史》的编写	287
2、夏曾佑的历史进化观	289
3、文化史观	292
4、历史编纂学的贡献	297
<b>二、刘师培的史学</b>	<b>301</b>
1、刘师培的生平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	

编纂	301
2、批判旧史提倡民族主义史学	303
3、运用进化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	306

## 第六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

<b>一、孙中山的民生史观</b>	314
<b>二、章太炎的史学思想</b>	318
1、章太炎的生平及其主要历史著作的编撰	318
2、习史与爱国	323
3、求真与进化	325
4、体例与方法	328
<b>三、陈天华的革命史观</b>	333
1、陈天华与梁启超关于革命史观之分争	333
2、陈天华用“法戒”的观点分析历史	336
3、陈天华的社会进化观	339

## 第七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b>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b>	343
<b>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b>	349

## 附录

<b>一、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旧史书的继续编纂</b>	359
1、官修各史书	359
(1) 清朝修史的机构	359
(2) 《起居注》和《实录》	364
(3) 《方略》及《始末》	366
(4) 《国史》及《圣训》	369
(5) 政书	370

2、私人修纂各史书	372
(1) 《东华录》	372
(2) 集传与传著	374
(3) 掌故、典制	376
(4) 地方志	378
(5) 纪事本末体各史书	379
(6) 学术史	385
<b>二、古史的研究及其成就</b>	<b>388</b>
1、旧史补作与改订	388
2、旧史表志的补订及补注与校订	394
3、古史史料的整理、旧史辑佚及金石文集 结与研究	397
4、历史地理及边疆地理	402
<b>后记</b>	<b>405</b>

# 第一章 封建史学的蜕变期（一）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史学

## 一、乾嘉考据学的没落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成为统治整个学术界的一大学派，即考据学派。所谓考据学派就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而言，它是从事具体的研究，形成了和高谈天理、性、命的宋明理学迥然不同的学风。就其学术宗旨而言，又称为汉学。汉学是指研究经学回溯和尊崇汉代的经学，是相对于宋学而言的。这个学派就其时间而言，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也就是乾嘉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

乾嘉考据学派是从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的思潮发展来的。顾、黄均生活在明末清初，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商人市民意识的反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某些启蒙思想，同时，又经历了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洗礼，具有较强烈的抗清意识，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批判了宋明理学。他们反对宋学“空谈”，主张“穷经研史”，“经世致用”，用“经学”来代替“理学”。顾炎武研究经学的目的是为了致用，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者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sup>①</sup>。顾炎武、黄宗羲治学所关心的是当世之务，所提倡的考据又正是为了矫正宋明理学空谈心理、束书不观之弊，并且与反对清初民

①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人与书二》。

族压迫的形势紧密相关。

但是，乾嘉时代的学者，处于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之下，不敢议论当代的社会政治问题，也不敢编写历史，只是考史而不敢论史，脱离实际，逃避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养成了烦琐的学风，研究的领域也十分狭窄，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被引向对古文文献的整理、诠释上去。例如，顾炎武研究历史、地理，编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固然也论列山川形势，城邑关隘，但都着眼于现实，按照“郡国”的框框，著录明朝社会经济的许多重要资料，并针对明朝社会最根本的矛盾，从各个不同的省府州县，把徭役太重、赋役负担不均、人们准备改革的措施，以及从不同的利益出发对这些改革所作出的不同反映，顾炎武按其地域特色的面貌，一一勾画出来。作者较全面地搜集资料，寻其当代利病的问题，无隐藏地把地主阶级加重社会矛盾的种种花样，如诡寄、酒派、换标、改册、隐匿赋役、接受投献、掠占屯田等等一一揭露，这不仅资料丰富详实，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作者面对现实的激进态度。乾嘉学者也都精于地理学，如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胡渭撰《禹贡锥指》等都是获得好评的佳作，但都停留在诠释古书古史，进行古地理考证，抛弃了经世致用的目的。因此，乾嘉学者在古籍整理与考订方面，虽然做出了不少成绩，对后人阅读、研究古籍带来了很大方便，然而，对史学的研究成果创造发明却少得可怜。

当乾嘉考据学笼罩整个学术界时，部分学者已对它产生不满。如凌廷堪、沈复等人就对它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凌廷堪（1755年—1809年），字次仲，安徽歙县人。其父经商于海州之坂浦场，遂移家其地。他六岁时父亲死，家贫，12岁时不能继续读书而学贾，20岁以后，始发愤读书，27岁时至扬州，从事校勘，参加词曲馆检校词曲中字句违碍者。29岁时至京师，始习举子业，考中进士后

任宁国府教授。他极推崇其同乡江永、戴震的学术，反对宋明理学，认为朱熹和王阳明都袭取了佛、老的思想，违背了儒学正统。

凌廷堪将汉学之弊，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知识浅陋，为学不通世务，不切时用，指出汉学家“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傍，而语以古今成败，若坐雾雾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①。

（二）有些汉学家并未研究宋学，而“最恶宋之儒者，闻人举其名，则骂不休”②。而高自标置，以为千古绝业，其实对学问一窍不通。

（三）汉学本主以训诂明义理，但其弊极至以许慎掩周孔，他说：“六书废已久，训诂多阙残，一二笃信儒，阐发诚艰难，殷殷考订时，亦择心所安。纤兜择唾余，群籍束不观，但取许氏书，闭户施铅丹，《六经》所有字，无不遭讥弹，《说文》未载者，毅然信笔删。用力既不多，已足惊愚顽，寻彼沽誉念，真见其肺肝。宋儒论错简，厥咎尚可宽，似此僭妄罪，何止如邱山！岂其许叔重（慎），遂掩周孔还？”③

（四）汉学家不明礼之器数仪节为考核义理之原，因而错误百出。他说：“儒者不明礼，六籍皆茫然，于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不明祭制，《洛诰》何以诠？不明宫室制，《顾命》何以传？不明有司彻，安知《楚茨》篇？不明大射仪，安能释《宾筵》？不明舆与荐，《易象》孰究研？不明聘与觐，《春秋》孰贯穿？如衣之有领，如官之有联，稽古冀有获，用志须精专”④。

①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23，《大梁与牛次原书》。

②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35，《汪容甫墓志铭》。

③ 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5，《学古诗之一》。

④ 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5，《学古诗》。

汉学之流弊既然如此之深，乾嘉学风非改变不可，而且凌廷堪通过对中国历代学术史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认为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并且尖锐地指出：“当其将变也，千百人哗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既变也，千百人靡然而从之者亦庸人也，矫其弊，毅然而持之者谁乎？”<sup>①</sup>汉学到乾嘉时已臻全盛，但其流弊危害亦大，凌廷堪在其著作中大声疾呼，实际上是号召学者们起来批判乾嘉考据学，使学术能转向新的方向。

在史学方面，凌廷堪竭力批判宋儒的严辨正统的史观，提出：“史以载治乱，学者资考究。胡为攀麟经，师心失所守，拘拘论正统，脱口即纰缪。”认为拓跋族兴起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不能因其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就否定其政权“无授受”。在他看来，“金源有天下，四海尽稽首，世宗三十年，德共汉文懋”。将金世宗的治绩，比之与汉文帝相等，不能因为其少数民族，便加以抹杀。凌廷堪讥正统论者为“贼儒之陋”，说他们是“兔园迂老生，永被见闻囿，安得如椽笔，一洗贱儒陋”<sup>②</sup>。因此，他在所撰《十六国名臣序赞》中，对佐理少数民族所建立政权的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如范长生、陈元达、张宾、王猛等人，都极表敬仰，肯定其功绩。这反映他处于乾嘉时期，汉满民族矛盾较缓和，因此，他的史学观点和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完全不同。

沈垚(1795年—1840年)，字敦三，号子敦，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人，其祖籍原为江苏震泽县，祖父时始迁居乌程南浔镇。这一地区早在明中叶资本主义即已萌芽，处于这样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地

① 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23，《太梁与牛次原书》。

② 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5，《学古诗》。

区，对沈垚的思想意识有重大影响。他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①一反封建士大夫的传统看法，给予商贾新的地位，认为豪杰智略之士都出自商贾阶层。他的看法，自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喜。故一生不得志，至京师，为徐松、姚元之、沈涛、徐宝善等编撰书籍。他原治小学，后来转到经世之学，专研西北边疆地理，著有《新疆私议》、《漳北澠南诸水考》《水经注地各释》、《西北地名杂考》、《元和郡县志补图》《地道记》等。其著述均收集在《落帆楼文集》内。

沈垚从事西北边疆地理研究，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由于沙俄对新疆地区虎视眈眈，局势日益危急，而新疆的安危，又和整个国家的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写于道光八年（1828年）的《新疆私议》中说：“夫回部者安西、关内之藩篱也，四城者又回部之藩篱也。藩篱固则腹心安，腹心实则藩篱固。”但当时的统治集团却看不到这一点，有些人甚至提出：“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他指责这是“迂士之论”。沈垚从祖国的安全出发，必须保卫新疆，而保卫新疆必须发展其生产，在其地进行屯田积谷，解决驻守军队的军食和给养问题，这样做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阿克苏以东数千里，都是适宜于耕种的膏腴沃衍之地，只要政策采取措施，认真进行屯田积谷，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他驳斥不守新疆的谬论，指出“远终不可守乎，非也，不尽其守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不守远必守近，而守近之费不减于远，或更甚焉，则何如尽守之之术以守远，不弃可耕之地于外夷之为得也。”②

①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②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1，《新疆私议》。

随着国内外矛盾日趋尖锐，各种问题已汹涌而至，险象环生，但统治集团麻木不仁，一味地苟且偷安，沈垚对这种局面非常痛心，深有感慨地指出：“今日风气，备有元成（西汉两帝）时之阿谀，大中（唐宣宗年号）时之轻薄，明昌（金章宗年号）、贞祐（金宣宗年号）时之苟且，海宇清晏，而风俗如此，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有一于此，即不可终日，今乃合成一时之风俗，一世之人心，呜呼！斯岂细故也。”<sup>①</sup>对当时知识界人士的情况也作了扼要的概括。他说：

“大概近日所谓士，约有数端：或略窥语录，便自命为第一流人，而经史概未寓目，此欺人之一术也。或略窥近时考证家言，东抄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此又欺人之一术也。最下者，文理不通，虚字不顺；而秦权汉瓦，又欺人之一晋甓唐碑，撮拾琐屑，自谓考据金石，心极贪鄙，行如盗窃，斯术也。……”<sup>②</sup>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沈垚归咎于乾嘉以来的考据学，认为自乾隆中叶后，汉学考据家们，“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sup>③</sup>。其原因是古人经学，原求有益于身心，乾嘉时期汉学家研究经学，完全脱离现实，“但求名高于天下，故术愈精而人愈无用”。沈垚所目睹的情况，是数十年来的学者，“闻见自夸之人多，读书贯穿之人少”，尖锐地指出：

“课书二字，今殆将绝矣。夫小学特治经之门户，非即所以为学，金石特证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艺，本非古之所谓通儒，况但拾其唾余以瓦砾炫耀耶！然能以此炫耀者，群奉为读书人。而不工世俗之书，不为昏夜之乞，虽有瓦砾之耀，终于

①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8，《与张渊浦》。

②③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8，《与孙愈愚》。

进取尺寸无获，故以瓦砾者，亦落落不数见。”<sup>①</sup>

沈垚已深刻地看出乾嘉考据学已完全无用，已完全陷于绝境，故积极地加以批判，亟思破门而出，故走上了经世致用的治学道路，在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仍然“藉考证以自给，而意之所期实不愿以考证见”，为了谋生，非搞考证不可，正如他自己所说，“诚可悲也”<sup>②</sup>。且在史观上也囿于闻见，认为“天下之乱，系乎风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风俗美则小人勉慕于仁义，风俗恶则君子亦宛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厉风俗为先务”<sup>③</sup>。强调治乱之故，“系于当时之好尚”<sup>④</sup>。在他看来，周、汉以下各朝代，大概人争立名则世治，人争殖利则世乱。虽然，仍未能揭示出社会历史治乱的实质和根本原因。但是，从沈垚的著作中已表明了乾嘉考据学派的分解和日趋没落，标志着改革派史学的即将产生和出现。

## 二、龚自珍的史学思想

### 1、龚自珍生平及其主要史学著述

龚自珍是鸦片战争前清封建社会分解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是晚清时期杰出的初期启蒙思想家和史学家。字尔丘，又字璱人，伯定，更名易简，又改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

①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8，《与张渊浦》。

②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10，《与王亮生》。

③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4，《风俗篇》。

④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4，《立名篇》。

州)人。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29年),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年仅50岁。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清廷礼部做过官,他本人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开始,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闲职十余年,长期受到清贵族统治集团的排挤压抑。道光九年(1829)年虽中进士,其政治地位仍未获改善,故他自称一生“困厄下僚”,“不得志于”“宦海”<sup>①</sup>“蹉跎一生”。道光十九年(1839年)辞官南下,两年后即鸦片战争后一年(1841年)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早期的学术思想活动,受公羊派学者的影响很大。比如公羊派学者刘逢禄等人宣扬“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圣人微言大义”,而龚自珍非常推崇,认为提倡变法,改革要从《公羊》中找答案。龚自珍在他的诗中说:“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sup>②</sup>也就是要抛弃乾嘉正统的训诂考据之学,而致力于被人奚落为“卖饼家”的今文经学。

龚自珍致力于今文经学的学习,对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有较深切的了解。著有《五经大义终始论》、《五经大义终始答问》、《春秋决事比》等文,主张学以致用。他与魏源、包世臣、周济等相友善,都要求改革当时的政治经济,以挽救国家危亡。遂为学术思想界开创了一种要求政治改革变制的新风气。他的主要史学著作有《古史钩沉论》四篇、《尊史》二篇、《对策》、《西域置行省议》以及金石、彝器考释和方志、传记、谱牒等文章数十篇。龚自珍虽不是史学名家,但是在他的文章中,窥千古之成败,振一代的疲癃。在鸦片战争后,人们诵史

① 《跋某帐后》,《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2页。

② 龚自珍:《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1页。